

觀點取替對態度極化的緩解作用：中介及遷移效果分析*

仲傳仁

英國薩里大學
心理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

林以正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黃金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

態度極化常造成群際間的不和與衝突，乃至社會動盪，因此探討態度極化的緩解兼具理論與應用價值。本研究探討觀點取替是否可改變個體資訊處理的方式，進而避免態度趨向極端。本研究以社會議題的書寫進行實驗，首先測量參與者書寫前對兩個社會議題（非核家園與廢除死刑）的同意程度，然後請參與者透過兩階段書寫來闡述對於兩個議題的論點。在第一個書寫階段，對其中一個議題進行書寫時，參與者均依照自身觀點書寫；在第二個書寫階段，對另外一個議題書寫時，一半的參與者依照自身觀點，另一半則透過觀點取替來依照對立方觀點進行書寫。實驗最後再次測量參與者對兩個議題的同意程度。結果發現，針對第二個書寫議題，相對於書寫自身觀點，當參與者想像身處於自己立場的對立方，並書寫該方的論點後，便不會產生態度極化。進一步對書寫文本進行字詞分析發現，觀點取替對態度極化的影響是由去脈絡化的推理模式中中介，此種推理模式的內涵是個體在遠離自我既有信念的情況下來處理對立方論點。本研究亦發現，對態度極化的緩解還能擴及未採取觀點取替的第一個議題，產生對議題態度的遷移效果。研究者亦針對這些發現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並討論在教育和其他領域上可能的應用。

關鍵詞：態度極化、觀點取替、遷移效果、文本分析

* 1. 通訊作者：黃金蘭，clhuang@mail.ntust.edu.tw。

2. 本研究在科技部計畫補助（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11-001-MY2; MOST 108-2410-H-011 -013 -MY3）下完成，謹此致謝。本文作者亦感謝三位匿名審查提供寶貴修改意見。

現代社會中，民眾所面對的公共議題往往涉及多元的面向和複雜的內涵，像臺灣 2018 年的十個公民投票案和 2021 年的四個公投案，內容就涵括能源（2018 年的以核養綠及 2021 年的重啟核四）、人權（2018 年的同志婚姻）和環保（2018 年的深澳電廠和 2021 年的藻礁議題）等等¹。這些議題的相關資訊龐雜繁複，且議題本身也往往具有社會爭議性。這些爭議可能在政治和社會氛圍的烘托下強化民眾的對立，造成態度上的極化，甚至形成教育者的挑戰（如臺灣同志議題產生的兩極對立和對教學者的影響，可見居佳勳，2018）。本文試圖從資訊處理的角度切入，探討觀點取替能否協助個體在接觸議題資訊時，避免受既有立場的影響而產生更極化的態度。

態度極化之所以作為本研究關切的核心變項，乃在於其對社會和諧和穩定的潛在危害。當對立雙方的態度趨向極端時，難免引發碰撞和衝突。衝突結果或許導致親友間關係的裂痕，或許造成社會上對峙的氛圍。有學者便表示：極端的態度和信念經常危害團體間的關係（Lilienfeld et al., 2009）；亦有政治學者指出：民眾在政治上的態度極化不時地衝擊臺灣的穩定發展（蕭怡靖，2014）。

除了其負面影響外，研究也已發現態度極化與資訊處理的密切關聯。許多研究指出，態度極化是個體在進行資訊處理後一個常見的反應，尤其當資訊內容涉及價值觀或政治認同上的爭議，如死刑議題（Lord & Taylor, 2009）、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和槍枝管理議題（Taber & Lodge, 2006），及性少數權利的議題（Wojcieszak, 2011; Wojcieszak & Price, 2010）。

研究者因此試圖了解，是否有方法讓個體在處理資訊後避免產生態度極化呢？過去研究發現在處理訊息時常見的肯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或偏誤同化（biased assimilation）傾向，極可能是個體在接觸不同立場資訊後產生態度極化的原因。研究者認為以觀點取替的方式處理訊息，可能得以降低上述偏誤的傾向。具體而言，本研究主張：個體若透過觀點取替來處理對立方的相關資訊，就可能減緩態度極化的產生，此效果甚至可以延伸到對其它爭議性議題的態度。本研究也將說明為何此觀點取替的練習易於被納入為課堂教材的環節。

研究者認為要能緩解對議題的態度極化，需從探究態度極化的成因開始。以下將整理過往文獻對此成因的分析，並檢討既有的學者提出的可能對策。透過比較過往研究的可取與不足之處，研究者將嘗試推導既能延續文獻焦點，亦符合理論預期的研究假設。

文獻探討

（一）態度極化的成因與緩解

Lilienfeld 等人（2009）整理了多項可能讓人立場趨向極端，乃至造成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ideological extremism）的認知偏誤歷程，如偏誤同化、我方偏誤（myside bias）、肯證偏誤等等。偏誤同化意指個體在評斷資訊說服力時，傾向於認定：符合自己既有態度的論述，相較於那些不符合自己態度的論述，存有更高的說服力（Lord et al., 1979）。而當個體對於自己贊成的立場能夠想出較多佐證的論據，並傾向忽略那些挑戰自己立場的論點時，個體便可能陷入了我方偏誤（Perkins, 1985; Wolfe & Britt, 2008）。肯證偏誤則反映出個體將外界資訊詮釋成符合自己預期的樣貌，並主動搜尋與自己預期相符的資訊（Nickerson, 1998; Wason, 1960）。除了肯證偏誤，也有學者提出反肯證偏誤（disconfirmation bias），其意涵為當個體面對與自己信念一致及對立的資訊時，會花較多的時間閱讀那些對立資訊，目的是思考其論述的缺陷並建構反駁意見（Edwards & Smith, 1996; Taber & Lodge, 2006）。雖然這些偏誤有不同的名稱，但概念上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有學者便將肯證偏誤和偏誤同化等而視之（Hergovich et al., 2010），亦有學者將偏誤同化與我方偏誤視為相同概念（McCrudden et al., 2016）。這些偏誤共同反映了：在資訊處理層次，態度極化是因為個體受既有的預期或立場所影響，而對資訊進行選擇性的詮釋、搜尋、忽略乃至說服力判斷等處理方式，以維持或強化既定信念。這些偏誤也說明了為何個體在接觸不論與自身立場相同或相異的資訊後，態度都可能更為極化。

對此，已有不少研究嘗試找出方法來改變這種傾向，以避免個體態度流於極端。針對這些方法，Lilienfeld 等人（2009）認為它們多數在理論上假定：個體之所以不易擺脫認知偏誤（如肯證偏誤、偏誤同化等）的影響，與雙重歷程理論（dual process theory）（Evans & Stanovich, 2013; Stanovich

& West, 2000) 中類型一歷程 (type 1 process) 的主導有關。類型一歷程反映了個體直覺性的思考，這種思考讓個體前意識地 (preconsciously) 選擇性關注與既定信念相關的資訊，並快速的做出與信念相符的捷思反應 (Evans, 2011, 2007)。若直覺性思考的結果未被類型二歷程 (type 2 process) 的分析性思考予以介入和推翻，那麼個體可能還會藉由類型二思考來進行偏誤的推理，引導個體避免尋求反例來挑戰或反證其信念 (Evans, 2007; Evans et al., 2001)。這種偏誤性的推理也進一步強化其既有的信念和假設。換言之，認知偏誤可能是類型一與類型二歷程共同作用的結果 (Evans, 2012)。而那些嘗試減少認知偏誤的研究，便著力於透過類型二思考來介入並改變類型一思考的產出。例如延遲個體做決定的時間點，讓個體有可能使用較多邏輯性分析來消化資訊並調整直覺反映 (Spengler et al., 1995)；又或者是直接向個體解釋認知偏誤的運作，讓個體在面對資訊時能夠覺察於直覺的影響 (Evans et al., 1994)。

觀點取替 (perspective taking) 即為這些抑制直覺過分主導的介入方法之一。觀點取替在近 20 年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其理論目的主要在於降低人際衝突、改善群際關係等。觀點取替不止反映了「從他人的觀點來看事情」這個行動或嘗試，也表示個體在認知層面上理解他人觀點，或同理他人的能力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觀點取替的相關研究已發現：當操弄個體去嘗試抱持他人觀點，或增加對他人觀點的理解時，能帶來諸多正面影響。例如提高個體的同理心 (Batson et al., 1997)、消解團體間的刻板印象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降低對外團體的偏見 (Todd et al., 2011; Vescio et al., 2003) 等等。教育領域的學者亦針對美國一萬三千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發現，觀點取替在大學生培養具社會責任感的領導力 (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 上扮演重要角色 (Dugan et al., 2014)。Dugan 等人根據其研究推論：觀點取替有助於大學生們將個人層次的領導特質 (如自信、責任感等) 轉化為團體層次的領導價值 (如樂於聆聽他人意見，善於帶動團隊合作等)。這說明了觀點取替對人際互動的正向作用。基於這些觀點取替的正面價值，教育學者也投入於研究能提升觀點取替和同理心的教學法，當中不乏跨領域間的嘗試，例如透過劇場教學 (李錦虹、林明德, 2021) 及遊戲設計 (Dishon & Kafai, 2020) 等方式。

以上這些觀點取替的研究，不論在社會心理學或教育領域，多聚焦在對「人」的態度。如面對外團體，乃至團隊中的成員時，如何能促進人際和諧、緩解負面態度。而本研究關切的焦點乃個體對「事」(即公共議題)的態度，以及這些態度如何因為資訊處理的偏誤而造成極化。研究者認為對「人」和對「事」的態度確實有區辨的必要。例如，劉政宏等人 (2008) 的「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arguments agreement/disagreement model of a counterpositional situation, CSAAM) 便對這兩種類型的態度做出某程度的區分。其模式指出，個體在處理立場對立者的論點時，一方面可能產生對於對立者的反感情緒，一方面也會判斷論點立場與自身立場的相符程度，以及論點的品質與說服力，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個體最終的論點贊否反應 (agreement/disagreement response)。其中對於對立者的反感情緒可視為對「人」的態度，這種反對情緒會引發反對傾向，進而影響對論點的贊同程度，而此作用的歷程是偏向自動化的 (類型一) 資訊處理。至於對論點立場及論點品質的判斷，以及這些判斷對論點贊否反應的作用則是通過較為認知層面的 (類型二) 處理歷程 (劉政宏等人, 2011)。

換言之，基於此模式 (CSAAM) 的發現，個體可能透過對立場對立者的態度，或對於論點本身的思考而影響對議題的態度。而與論點本身的思考是本研究較為關切的路徑，也就是說本研究試著了解觀點取替是否可能直接改變個體在認知層次上對議題資訊的處理方式，進而緩解個體態度極化的傾向。因此接下來研究者將聚焦觀點取替文獻中，與議題上的態度緩解有關的研究，並指出它們可能的理論缺口和改進方向。

1. 觀點取替與偏誤同化

過去已有研究在關注觀點取替對資訊處理的影響，雖然這些研究並未測量個體對相關議題的態度來作為依變項，但其結論與本研究的主張至為相關。這些研究發現觀點取替能夠降低偏誤同化的發生頻率 (Beatty & Thompson, 2012; McCrudden et al., 2016)。Beatty 與 Thompson (2012) 的研究讓實驗參與者閱讀數份調查報告，報告主題為一些犯罪行為或兒童教育等社會議題，例如，關於享受上學的程度以及學業表現兩變項的關係。每份調查報告都簡述了研究假設、不同的調查方法以及

調查結果，這些結果雖然僅為弱證據力，但乍看之下都支持兩個變項的正相關。當參與者閱讀調查報告後，研究人員要求他們先以調查人員的觀點來判斷各調查報告是否支持正相關，然後再以自己的觀點來做判斷。結果發現，採取的觀點與既有信念在佐證力判斷上會產生交互作用。相較於以自身觀點判斷，以調查人員的觀點進行判斷時，既有信念的效果較小，亦即較不受既有信念的影響。Beatty 與 Thompson 認為，以自己觀點來閱讀報告時，偏誤同化使得既有信念影響了最終判斷，而做出符合信念的結論；但觀點取替能抑制偏誤同化的作用，使參與者的判斷較不受自身信念主導。

一如 Lilienfeld 等人 (2009) 的觀察，在解釋實驗發現時，Beatty 與 Thompson (2012) 以雙重途徑理論為出發點。他們認為偏誤同化現象反映了類型一歷程中，既有信念對捷思反應的影響。而觀點取替能增加個體自我與資訊間的心理距離 (psychological distance)，有助於個體去脈絡化 (decontextualize) 地處理資訊。脈絡化推理 (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表示個體以自己過去的經驗和信念作為推理基礎；反過來說，去脈絡化推理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意指個體在遠離或擱置既定直覺反應的條件下對外資訊進行分析思考，因此被歸類為類型二歷程的一部份 (Thompson et al., 2005)。也就是說，Beatty 與 Thompson 認為，觀點取替促使個體進行去脈絡化的類型二歷程的分析推理，來介入類型一歷程的直覺推理。

McCrudden 等人 (2016) 一樣聚焦於觀點取替對偏誤同化的實驗，也得到類似的結果。研究設計中，他們讓參與者閱讀多篇調查報告，各調查報告包含了調查假設、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等內容，報告的主題則是氣候變遷是否正在發生。研究的依變項是參與者對這些報告的論證強度的評價，獨變項則包含：報告與參與者自身立場相同或相反、報告本身的論點強弱，以及閱讀報告時是採取環境科學家的觀點或自身觀點；其中觀點取替為受試者間變項。結果得到顯著的三階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則發現，信念一致性和觀點取替的交互作用只發生在弱論點的情況。亦即，在弱論點情況下，以自身觀點判斷時有穩定的信念偏誤效果，但若以科學家觀點判斷時則不受自身信念的影響，無信念偏誤效果。當參與者以自身觀點來閱讀報告，他們會產生偏誤同化，認為符合自身立場的報告，相較於和自身立場相反的報告，有較強的論證強度。而當參與者以環境科學家的觀點來閱讀報告後，他們認為不管是符合或異於自身立場的報告，其論證強度都差不多。根據這個結果，McCrudden 等人做出了類似 Beatty 與 Thompson (2012) 的主張：觀點取替提供了去脈絡化的基礎，在去脈絡化，或遠離自我既有信念的條件下，類型二的非直覺式、耗費認知資源的分析性思考便可能推翻類型一的初始判斷。

研究者認為，從他們的說明可看出，雖然認知偏誤往往出於類型一與類型二思考的共同作用 (Evans, 2012)，但若透過觀點取替讓個體的思考焦點遠離自身的直覺判斷，轉而聚焦外界資訊，便能介入類型一的歷程，讓稍後類型二的思考歷程達到較為客觀的結論。此種「自我遠離」實為去脈絡化推理之所以能減少認知偏誤的關鍵。

(1) 相關研究侷限。上述兩份研究可能的侷限在於：他們觀點取替的對象是調查報告的調查人員，但一般人在生活中所接觸到的資訊通常很少是學術報告，其中更少會包含假設、方法、結論等研究報告的形式。即便有些報導包含這些內容，大眾的閱聽習慣可能也僅是瀏覽標題或結論。換言之，上述以調查人員為觀點取替對象的研究，或許不適用於一般大眾面對資訊的模式和習慣。而另一項侷限在於，上述兩份研究都以雙重途徑理論為基礎，指出相較於以自己觀點來處理資訊，觀點取替讓個體進行去脈絡化的類型二推理，亦即在自我遠離的狀態下進行思考，來避免認知偏誤。但這仍屬事後的解釋架構，他們都沒有對這項機制提出中介歷程的證據。研究者認為，對於此機制的確認，可以透過字詞分析來完成。

(2) 以字詞分析檢視推理歷程。社會心理學者已經嘗試透過對個體的書寫文本進行分析，來探討書寫者的心理特性或認知模式。一項日漸普遍的分析工具是語文探索與字詞計算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此軟體可將書寫者使用的詞彙進行分類，如分成文法上常見的副詞、連接詞，乃至經過研究界定出的情緒詞、社會詞等等，並計算各種個詞類佔文本總詞數的百分比。LIWC 的相關研究已指出詞類使用會反映出書寫者的心理特性 (Pennebaker et al., 2003)，應用於分析中文書寫者的心理歷程上亦展現其成果 (林璋芳等人, 2021)。且由於書寫者並不知悉詞類指標的分類和定義，此工具應可有效避免預期效應 (demand characteristics) 的影響 (黃金蘭等人, 2012)。研究者認為，若能界定出去脈絡化推理所蘊含的「自我遠離」所對應的詞類指標，便可藉由分析個體在觀點取替後的書寫，來捕捉觀點取替與自我遠離的因果關係。

LIWC 的研究指出功能詞（如連接詞、介系詞等）中的代名詞能夠反映書寫者注意力指向的焦點。像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如「我」）的使用便代表了書寫者自我關注的程度。Newman 等人（2003）發現，人們在說謊時，會比在說真話時使用較少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他們援引溝通理論學者（Knapp et al., 1974）的觀點，認為這是因為謊言與說謊者真正的態度產生衝突，所以說謊者不自覺地減少自我參照（如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的使用）的頻率，以將謊言與自我進行切割（dissociate）。「我」的使用不僅反映書寫者的自我涉入程度，還因為展現了書寫者深切的自我掛懷，而可能成為負面情緒的指標之一。例如以自殺結束生命的詩人，相較於其他詩人，就會在書寫作品中使用更多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Stirman & Pennebaker, 2001）；關於此代名詞的差異一樣見於憂鬱患者與一般大學生的書寫比較（Rude et al., 2004）。

除了已發現「我」的使用與自我涉入程度的連結外，也有學者指出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如「他們」）通常反映個體對外在他群的關注（Quercia et al., 2011）。像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患者因為傾向將事件作許多的外歸因（external attribution），相較於情緒障礙（mood disorder）患者，他們會在書寫中使用更多的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Fineberg et al., 2015）。由於前已述及，觀點取替的操弄應該會讓個體產生自我遠離，使其注意力從自我的既定信念轉到外界他群。因此研究者認為，自我遠離應該反映較少自我涉入，與較多人關注的增加，因此可以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使用率減去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使用率作為指標。

2. 觀點取替與態度極化

前述兩份研究（Beatty & Thompson, 2012; McCrudden et al., 2016）是以結論或論點強弱判斷作為依變項來探究偏誤同化的程度，而不是本研究關切的個體本身的態度極化，雖然也有研究指出偏誤同化會導致態度極化（Lord et al., 1979），但無法因此直接說明觀點取替有降低態度極化的效果。針對這個缺口，近來確實有研究直接探討觀點取替對態度極化的影響（Tuller et al., 2015）。Tuller 等人（2015）的研究在觀點取替的主題和對象上也似乎比 Beatty 與 Thompson（2021）以及 McCrudden 等人（2016）的研究要更貼近社會大眾接觸資訊的日常情況：他們要求實驗參與者進行觀點取替的對象是在墮胎議題上與其立場對立的他人，而不是某調查報告的人員。Tuller 等人透過態度前後測的差異並作適當的轉換來捕捉態度極化。他們先讓參與者表示他們對墮胎的支持程度，接下來讓一半的參與者（控制組）用自己的觀點書寫對墮胎的立場，而另一半的參與者（觀點轉換組）則透過觀點取替書寫某個與自己態度相反之人的立場，最後再次測量他們對墮胎的支持度。結果發現相較於控制組，觀點轉換組的態度較明顯的轉向自己原本反對的方向，也就是說觀點取替產生了去極化（depolarization）的作用。然而在 Tuller 等人的研究中也主張，要達到減緩極化，還需要有真實的人際接觸以及一定程度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兩項條件。

研究者認為，此條件限定或許與 Tuller 等人（2015）的研究設計有關，由於他們的目的在於比較論述自身觀點和論述具體的他人觀點間的差別，而不像之前偏誤同化的研究關切參與者對資訊的處理方式，因此他們並未在參與者進行立場書寫前給予任何參考資料。缺乏閱讀資料可能造成的影響是：被指派要進行觀點取替的參與者只知道對方立場與自身不同，但不甚清楚對立方的論點，又或者缺乏啟動認知思考的刺激，因此在書寫後的判斷仍是以自身的直覺或初始反應為基礎，所以才需要其他的加強條件。亦即，Tuller 等人的結果需要與觀點取替對象有親身互動及有書寫的課責性，透過與人的連結達到極化的緩解效果。這也呼應過往的觀點取替研究（如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 Todd et al., 2011）多在與「人」相關的刻板印象或外團體偏見等主題上產生減緩效果。

也就是說，研究者認為 Tuller 等人（2015）的發現正是展現了前面曾提及的「從人到事」的一種間接的態度改變。他們研究的參與者似乎是因為真實的互動而增加了對於立場對立者的好感，進而對於對立的立場也有正向的態度。之所以會產生這種間接的態度改變，似乎類似於推敲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Petty & Cacioppo, 1996）所提的周邊路徑（peripheral route），也就是透過與訊息相關的正負向提示（例如訊息提供者的可信度或吸引力）來判斷訊息的說服力，而非透過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即透過對訊息本身的邏輯推理來判斷訊息說服力²。而本研究關切的核心議題為極化緩解，而非對團體（人）的態度緩解。也就是說本研究想了解的是，對於議題的觀點取替書寫，能否不透過人際的接觸，就達到極化緩解效果？研究者認為要達到此效

果的一個可能方式是，在進行觀點取替書寫前給予相關的參考資料，以提高個體啟動認知思考，採取中央路徑的可能。

經整理以上三項研究及其特有的優點和侷限，研究者認為，若要以觀點取替為出發點來深化態度極化的研究，進而對相關文獻做出貢獻，至少需朝以下三個研究方向延伸：第一，設計更接近日常可行的觀點取替操弄，如 Tuller 等人（2015）的研究，以「與自己立場不同者」為觀點取替對象，而非某研究報告的研究人員；第二，若透過書寫前參考資料的提供，或許便不必限縮於必須預先經歷親身互動及課責性等條件；第三，如前所提及，透過 LIWC 來檢視觀點取替降低態度極化的途徑，即 Beatty 與 Thompson（2012）以及 McCrudden 等人（2016）所主張的去脈絡化推理或自我遠離。

（二）觀點取替對議題的遷移效果

研究者進一步感興趣的提問是，倘若觀點取替可以緩解態度極化，此效果能否發揮遷移效應，擴及減緩對其他議題的態度極化？以 Tuller 等人（2015）的研究為例，他們檢視觀點取替如何讓個體在墮胎議題產生態度上的去極化。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是否這種態度改變會遷移至其他未經觀點取替操弄的議題，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就研究者所知，此遷移效果似乎尚未有學者進行分析。儘管缺乏直接文獻支持此假設，但研究者認為接觸理論中關於次級遷移效果（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Pettigrew, 2009）的研究為此提問提供了很好的推論基礎。

接觸理論主張與某團體成員的正向接觸或互動經驗有助於減少對該團體整體的偏見（Pettigrew & Tropp, 2006）。此領域的學者亦探究一個相關問題：經由群際接觸而來的正向效果有多大的擴散性。也就是說，既然傳統接觸理論主張其正向效果會由某位互動的外團體成員拓展至其所屬的整個外團體（學者稱為初級外團體，primary group），那麼是否有可能進一步拓展到與互動對象不同的其他外團體（次級外團體，secondary group）呢？研究發現是肯定的。此種對次級外團體擴散的效果被接觸理論學者稱為次級遷移效果。次級遷移效果的相關研究多聚焦於當今群際衝突頻仍的區域。舉例來說，有研究（Tausch et al., 2010）透過問卷分析發現，當希臘裔的賽普勒斯人與土耳其裔的賽普勒斯人有愈多接觸，就對一般土耳其人有較正向的態度。

雖然本研究並未聚焦於接觸理論，研究者認為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觀點取替是否也可能以「事」為對象，讓個體對「初級議題」的評價擴散或延續到對那些沒有實際進行觀點取替的議題的評價，產生「議題上的遷移效果」？

就理論面言，議題的遷移效果確實可能存在。Pettigrew（1997, 2009）在說明接觸效果的擴散性時，曾表示：當個體與某（初級）外團體接觸後，會開始重新評估自身所處的內團體（ingroup reappraisal），逐漸發現內團體的規範和習慣並非與他人相處的唯一標準。Pettigrew 接著說明，這個重新評估乃一個去偏狹化（deprovincialization）的過程，減少個體以過度本位的視角來評估其他團體，甚至無形中拉大了個體與內團體的距離。這種去偏狹化使得個體在看待其他（次級）外團體也能減少偏見的激發，因此產生遷移效果。研究者認為，以上 Pettigrew 的論述其實相當接近於前述偏誤同化文獻對於觀點取替的分析。Beatty 與 Thompson（2012）以及 McCrudden 等人（2016）從雙重途徑理論的角度切入，認為觀點取替能透過去脈絡化思考來避免直覺的主導和認知偏誤的產生。比較 Pettigrew 和偏誤同化文獻對各自機制的說明可發現：去偏狹化和前述的自我遠離都反映了某種心理距離的增加，使得自身在理解外界資訊時，能鬆綁既定標準或視角的拘束。既然接觸理論和觀點取替都機制有概念上的相似性，那麼應該可假設觀點取替也會在對議題的態度上產生某種遷移效果。

（三）研究假設

綜觀以上文獻整理，可見多位學者以雙重途徑理論來解釋個體資訊處理層次的態度極化，並主張以觀點取替作為緩解方法。雖然以調查報告的調查人員作為觀點取替對象可以減少偏誤同化，但調查報告並非一般大眾主要的資訊來源，為了提出一個較具日常普遍性、較具實用性的觀點取替操弄，並檢視觀點取替緩解極化的效果，本研究的第一項假設為：相較於理解並書寫自己對某議題的觀點，當個體透過先行理解對立論點，再進行觀點取替書寫對立方觀點後，態度極化可獲得到緩解。

此外，雖然學者透過雙重途徑理論指出觀點取替緩解極化的機制為蘊含於去脈絡化推理中的自我遠離，但迄今尚未有此機制的直接研究證據。是故，本研究提出第二項假設：相較於書寫自身觀點，進行觀點取替書寫時會展現較多的去脈絡化推理或自我遠離，而此種書寫特性會中介假設一的觀點取替效果。

最後，鑑於遷移效果的可能機制（去偏狹化），以及自我遠離，這兩者在概念上有一定程度的類似，本研究乃提出第三項假設：觀點取替對態度極化的緩解效果不限於觀點取替操作時所書寫的議題，還會遷移到對其他議題的態度，產生議題的遷移效果。

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於網路公布欄（批踢踢實驗坊）刊登招募訊息，對參與者的要求如下：性別與學歷不拘，須以中文為母語，並能流暢的使用電腦打字書寫。本研究共招募了 98 位參與者（52 名男性），平均年齡 23.7 歲（ $SD = 3.4$ ），他們完成實驗後可獲得新臺幣 150 元酬金。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受試者間設計，獨變項為參與者書寫與自己立場一致的觀點與否：有一半的參與者透過文字說明自身對某議題的觀點，另一半的參與者則就該議題寫下與自身立場對立的觀點。依變項則是參與者們對於該議題在書寫前後的態度極化程度。

為了檢視態度緩解是否會擴散到其他議題而產生遷移效果，本研究選擇了兩項議題作為書寫主題。所有參與者都會先對其中一項議題書寫自身觀點，然後再依照前述的分組，對另一項議題書寫自身觀點或對立觀點。因此有一半的參與者針對兩項議題都依照自身信念書寫，另一半的參與者則先書寫自身觀點再書寫對立觀點。第二個依變項即為對第一個書寫議題的態度極化程度。

（三）研究工具

1. 議題選擇

為確保參與者對書寫主題抱持一定的立場強度，因而能抒發觀點，本研究選擇了兩項在臺灣經常引起廣泛討論的公共議題：「非核家園」與「廢除死刑」。參與者對兩項議題應該有一定的認識，並抱持一定程度的偏好。且在一份預試中，研究者測量了參與者對此二議題的同意程度，結果發現有一定的正相關（Pearson 相關係數為 .26， $p = .004$ ， $N = 121$ ）。這種共變關係一定程度上表示，當個體對其中一個議題的態度產生改變時，或許也會連帶影響對另一個議題的態度，提供我們捕捉遷移效果存在的可能性。

2. 正反立場論點提示

本研究仍針對兩項議題的正反立場提供了論點提示。研究者在進行文獻整理時，已經點出以下數個提供論點參考的理由：第一，可避免參與者對於對立方（乃至自己支持方）的論點不甚清楚或記憶模糊，而仍依賴於既定信念。第二，幫助進行觀點取替的參與者更容易想像自己身為對立方的一員。一如偏誤同化文獻為了讓實驗參與者能順利採用調查人員的觀點，提供了包含假設、方法、結果的調查報告。換言之，論點提示可避免讓觀點取替的指示流於表面。第三，這些論點提示均採條列式，如一則支持非核家園的論點提示為：「核廢料問題依舊是無解的問題」，又如一則反對廢除死刑的論點提示為：「死刑還給受害者公道」。這種呈現方式近似於一般大眾接收相關媒體資訊後，對該議題留下的心理表徵或概念，因此提供了一個具日常普遍性、較簡易操作的操弄範例。

具體而言，論點提示的內容是從維基百科所節錄出的論點，研究者讓正反方的論點內容在長度上近似。每份提示僅針對一個議題的一種立場，摘要性地陳列了對於該立場常見的支持理由，故兩個議題總共有四個版本的論點提示。

3. 態度測量

本研究以李克氏 (Likert) 七點量表詢問參與者對於「非核家園」與「廢除死刑」兩項議題的支持程度，1 表示完全不贊成，7 表示完全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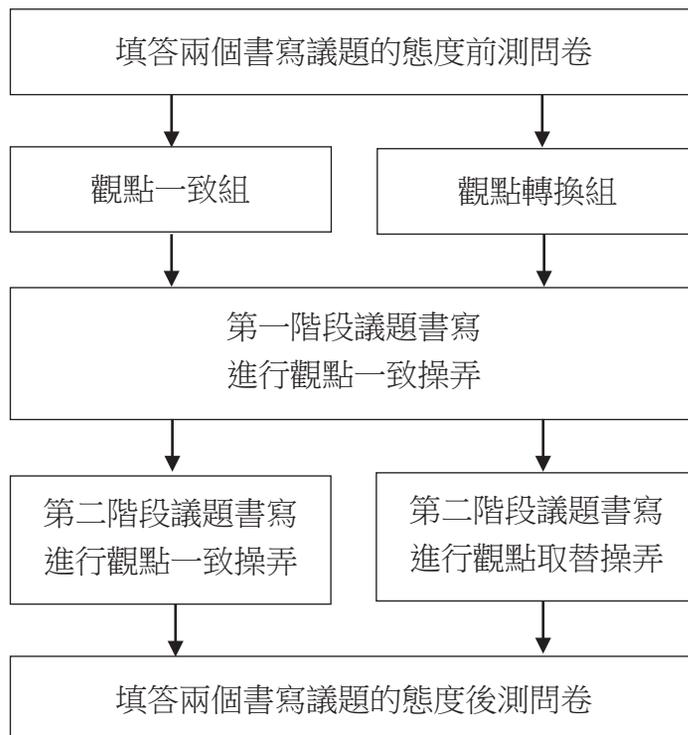
4. 字詞分析

一如文獻討論時所提及，本研究將透過語文探索與字詞計算 (LIWC) 來分析參與者的書寫文本。而自我遠離的指標將以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的減少與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的增加來表示。

(四) 研究程序

研究者於網路公布了招募訊息後，依據參與者所回覆的報名資料和方便的時段，邀請對方出席實驗。待時段確定後，研究者請參與者們先行填答一份網路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社會議題態度調查前測，以及其他與本研究無直接相關的量表。研究參與者於約定時段到達實驗室後，先聽取研究者的實驗說明，被告知會要針對兩個議題進行電腦打字書寫，以及其他注意事項。參與者確認沒有問題後便簽寫實驗同意書並開始進行實驗。實驗流程可見圖 1。

圖 1
議題書寫實驗進行流程



研究人員首先透過隨機分派，讓一半的參與者在兩次書寫時都僅需表達自身觀點（下稱「觀點一致組」），並讓另一半的參與者在針對第一個議題書寫時表達自身觀點，但是在書寫第二個議題前需經過觀點取替的操弄（下稱「觀點轉換組」）。由於每位參與者均須針對非核家園和廢除死刑兩議題進行論點書寫，觀點一致和觀點轉換兩組中都有一半的參與者被隨機分派為先就非核家園進行書寫，再進行廢除死刑的書寫，另一半的書寫順序則相反。

隨機分組完成後，每位參與者都會依照第一個書寫的議題，由研究者詢問其對於該議題的立場是支持或反對，然後給予該立場的論點提示。舉例而言，若某參與者首先書寫的議題為廢除死刑，並在研究人員詢問時對廢除死刑表示支持，研究者當下便給他一份支持廢除死刑的論點提示。參與者需針對該議題試寫一篇類似部落格的文章，指導語為：

我們要請您試寫一篇部落格或網路 PO 文，表達您對廢除死刑的觀點。這裡有一張在維基百科收錄的常見理由提供您參考。請您花三分鐘思考與整理你對廢除死刑的主張。書寫時請盡可能深入而完整地描述，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與感受，並試著寫下此議題發展對您與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請寫滿 300 字以上，並盡量在十分鐘以內完成。

三分鐘過後，研究者取走論點提示並請參與者開始書寫。完成後，接著進行第二個議題的寫作。此部分的流程和書寫規定大致和之前相同，唯一的差別是觀點一致組的參與者一樣拿到一份與其立場一致的論點提示，觀點轉換組的參與者拿到的論點提示則與其立場相反。觀點轉換組的參與者需想像自己是站在對立方的一員來書寫，以廢除死刑指導語為例：

接下來請您書寫關於廢除死刑的觀點。既然它是一個社會議題，必然就有其他的民眾抱持著與您不同甚或對立的觀點。接下來，我們想請您試著了解那些對立者的觀點，試著站在他們的觀點（也就是與您『對立』的觀點），寫一篇部落格或網路 PO 文。這裡有一張在維基百科收錄的常見理由提供您參考。請您花三分鐘思考與整理對立觀點的主張。三分鐘後，請您假想您就是那些民眾之一，試寫一篇部落格或網路 PO 文，表達他對於該議題的主張。書寫時請您設身處地盡可能深入而完整地描述，他內心真正的想法與感受，並試著寫下此議題發展對他與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請寫滿 300 字以上，並盡量在十分鐘以內完成。

第二階段書寫完成後，參與者填答對兩個議題的社會議題態度後測。至此實驗結束，接著研究者詢問參與者對於此實驗的問題與想法，發現並無參與者正確指出實驗目的。研究者對實驗做出說明後，對參與者致謝及給予實驗酬金。

結果

（一）資料前置處理

本研究先針對各篇書寫文本更正錯別字，並確定書寫內容符合指導語。結果發現有 3 名參與者未依指導語要求進行觀點取替書寫對立方主張，將其排除。故進入最後分析的資料共 95 名參與者（50 名女性；平均年齡 23.7 歲， $SD = 3.4$ ）。研究者以中研院網路斷詞系統對所有文本進行斷詞處理，並完成相關的前置處理，如去除多餘標記，標點符號的全半型轉換等，然後將文本匯入以 C-LIWC2015 為詞典（林瑋芳等人，2020）的 LIWC2015 程式（Pennebaker et al., 2015）進行分析。

由於依變項是兩個書寫議題態度極化的程度，故需先計算態度極化的程度。態度極化的產生係相對於前測，後測分數越往量尺的兩端挪移；若後測越往中間挪移，則表示態度趨緩。因此在計算時須先以參與者在書寫前對研究者口頭回應的議題立場為基準點來計算。舉例而言，如果某參與者在書寫前面對研究者詢問是否支持非核家園時，回答了支持，那麼便以書寫後對該非核家園的態度測量減去書寫前的態度測量，來得到態度極化的程度；若他在書寫前告訴研究者他反對非核家園，那麼極化指標就需要在後測減前測後，進行方向性轉換，計算方式可見表 1。如此計算出參與者對兩次書寫的態度極化程度，其描述統計可見表 2。

表 1
態度極化指標計算方式示例

	立場表示	態度極化計算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	態度極化分數
受試者 1	支持	後測減前測	5	6	1 (= 6-5)
受試者 2			5	2	-3 (= 2-5)
受試者 3	反對	-(後測減前測)	3	6	-3 (= 3-6)
受試者 4			3	2	1 (= 3-2)

表 2
態度極化程度的描述統計

	第一個書寫議題		第二個書寫議題	
	<i>M</i>	<i>SD</i>	<i>M</i>	<i>SD</i>
觀點一致組 (<i>n</i> = 47)	0.79	1.56	0.77	1.09
觀點轉換組 (<i>n</i> = 48)	0.10	1.37	-0.02	1.74

^a 兩組均以自我觀點書寫。

^b 觀點一致組以自我觀點書寫；觀點轉換組採對立方觀點書寫。

為了確認可以將不同書寫順序（先寫非核家園或先寫廢除死刑）的資料合併分析，首先檢驗實驗操弄以及書寫順序是否會在依變項上產生交互作用。以兩個議題的態度極化程度為依變項，觀點操弄與書寫順序為獨變項，進行雙因子受試者間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並無顯著的交互作用 ($F_s(1, 91) < 3.63, p_s > .060, \eta_p^2 < .038$)，表示議題書寫順序對依變項無顯著影響，可以將資料合併分析³。

(二) 態度極化程度

接下來以第二個書寫議題的態度極化程度為依變項，觀點操弄為獨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觀點一致組的態度極化程度顯著高於觀點轉換組 ($t(93) = 2.63, p = .010, d = 0.540$)⁴。而進一步由單一樣本 *t* 檢定來比較兩組態度極化的程度與 0 的差異，發現觀點一致組的態度極化顯著大於 0 ($t(46) = 4.83, p < .001, d = 0.704$)，觀點轉換組則無顯著差異 ($t(47) = -0.08, p = .934, d = 0.012$)。這些結果符合假設一的預測，在兩組之間進行比較時，在極化指標上，觀點一致組相較於觀點轉換組有更強烈的態度極化。在與 0 進行比較時，觀點一致組產生了態度改變，而且是更加極化，然而觀點轉換組則無態度極化，也未見態度反轉。

(三) 中介機制：自我遠離

接下來檢視對第二個書寫議題所使用的第三人稱複數與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的使用率。如前所述，研究者以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的使用頻率減去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的使用頻率，來代表參與者自我遠離的程度。首先發現觀點一致組在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的使用頻率上顯著高於觀點轉換組 ($t(93) = 4.57, p < .001, d = 0.943$)，但兩組在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的頻率上並無顯著差異 ($t(93) = -1.49, p = .142, d = 0.303$)，而觀點一致組在自我遠離指標的使用頻率上則顯著低於觀點轉換組 ($t(93) = -4.34, p < .001, d = 0.890$)，描述統計如表 3。接下來以自我遠離指標作為中介變項，並以 Hayes 的 process 巨集 (2017) 來檢定此變項是否會中介觀點取替對態度極化的影響。結果如圖 2，將總效果 (total effect: $c = -0.79, p = .010$) 拆解後可發現，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 為一負值 ($ab = -0.28$)，其所處的 95% 信心水準之信賴區間不包含 0 ($-0.54 \sim -0.07$; 5000 bootstrap samples, bias corrected method)，表示有顯著的中介作用，直接效果 (direct effect) 則並不顯著 ($c' = -0.50, p = .122$)⁵。由於在模型中，觀點一致組的二分變數值為 0，觀點轉換組為 1，因此由中介分析的結果可知，觀點轉換組使用了較多的自我遠離指標 ($a = 0.96, p < .001$)，而有了較少的態度極化 ($b =$

-0.30, $p = .034$)。此結果符合假設二的預測，亦即假設一可能的中介途徑之一為觀點轉換組在書寫時展現了更多的自我遠離⁶，使得態度極化獲得緩解。

由於對於第一個書寫議題兩組都進行觀點一致的書寫，其使用詞頻或許反映出參與者的書寫習慣，而可作為控制變項來確認自我遠離指標的中介效果，因此對第一個書寫議題的各詞頻亦進行檢驗。首先發現在各詞類或指標的使用頻率上兩組間均無顯著差異 ($ps > .293$)。而在中介分析時將第一個書寫議題的自我遠離指標作為控制變項，結果發現第二個書寫議題的自我遠離指標仍然扮演假設一之中介途徑之一。間接效果為一負值 ($ab = -0.30$)，其所處的 95% 信心水準之信賴區間不包含 0 ($-0.57 \sim -0.07$; 5000 bootstrap samples, bias corrected method)；直接效果並不顯著 ($c' = -0.51, p = .126$)。相較觀點一致組，觀點轉換組使用了較多的自我遠離指標 ($a = 1.01, p < .001$)，而有了較少的態度極化 ($b = -0.29, p = .040$)。

表 3
LIWC 詞類使用百分比描述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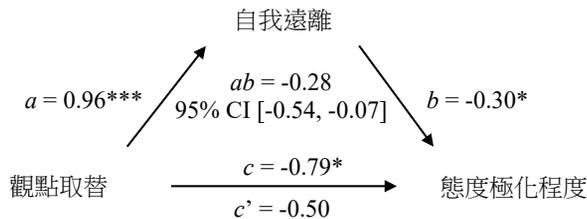
	自我遠離指標 ^a		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	
	<i>M</i>	<i>SD</i>	<i>M</i>	<i>SD</i>	<i>M</i>	<i>SD</i>
第二個書寫議題 ^b						
觀點一致組 ($n = 47$)	-1.04	1.20	1.19	1.03	0.15	0.38
觀點轉換組 ($n = 48$)	-0.08	0.95	0.41	0.53	0.34	0.80
第一個書寫議題 ^c						
觀點一致組 ($n = 47$)	-0.88	0.94	0.95	0.92	0.07	0.18
觀點轉換組 ($n = 48$)	-1.06	0.83	1.14	0.85	0.09	0.22

^a 此指標計算方式為 (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 - 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b 觀點一致組以自我觀點書寫；觀點轉換組採對立方觀點書寫。

^c 兩組均以自我觀點書寫。

圖 2
去脈絡化推理 (自我遠離) 作為觀點取替與態度極化程度間之中介變項



* $p < .05$. *** $p < .001$.

(四) 議題的遷移效果

接下來以第一個書寫議題的態度極化程度為依變項，觀點操弄為獨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觀點一致組的態度極化程度顯著高於觀點轉換組 ($t(93) = 2.27, p = .026, d = 0.465$)⁷。這表示，雖然兩組在書寫第一個議題時都是闡述自己的觀點，但寫完了兩篇書寫後，觀點轉換組的態度極化相較觀點一致組，仍然產生了緩解。也就是說，觀點取替對第二個書寫議題的影響擴及了第一個書寫議題，展現了議題的遷移效果，符合假設三的預測。若進一步由單一樣本 t 檢定來比較兩組態度極化的程度與 0 的差異，發現觀點一致組的態度極化顯著大於 0 ($t(46) = 3.46, p = .001, d = 0.505$)，觀點轉換組則無顯著差異 ($t(47) = 0.53, p = .601, d = 0.076$)。這些結果表示，在與 0 進行

比較時，觀點一致組再次造成了態度極化；然而，同樣使用觀點一致書寫的觀點轉換組卻沒有態度極化。這說明了：若以兩組進行比較時，觀點轉換組相較於觀點一致組確實緩解了極化效果。

(五) 補充分析

雖然在兩個書寫議題上，觀點轉換組的態度極化指標都非顯著不為 0，但並不代表觀點轉換組的態度沒有變動。若計算「態度變動」，即態度前後測差異的絕對值，研究者發現觀點轉換組不論是第一篇書寫 ($M = 0.85, SD = 1.07$) 或第二篇書寫 ($M = 1.06, SD = 1.37$) 都有顯著大於 0 的變化 (分別為 $t(47) = 5.52, t(47) = 5.36, ps < .001, ds > 0.773$)。表示觀點取替操弄確實造成態度的變動，只是將變動的方向納入考慮而計算態度極化時，其幅度與 0 的差距不顯著。

此外，如前所提及，在一份預試中發現參與者對兩項議題的態度有正相關 ($r(119) = .26, p = .004$)，而本研究也得到相同結果，即對非核家園和廢除死刑的前測態度有正相關 ($r(93) = .37, p < .001$)。若對兩個議題的後測態度再進行 Pearson 相關檢定，發現正相關仍然存在 ($r(93) = .24, p = .021$)。但若進一步對兩組各自進行相關性檢定，發現關聯性乃來自於觀點一致組 (r 一致組 = $.35, p = .015, n = 47$; r 轉換組 = $.14, p = .336, n = 48$)。

與上述相反的趨勢發生於對兩個議題態度極化程度的相關性檢定。首先，兩者一樣有正相關 ($r(93) = .22, p = .029$)。但若再對兩組各自進行檢定，卻發現關聯是來自於觀點轉換組 (r 轉換組 = $.37, p = .011, n = 48$; r 一致組 = $-.08, p = .587, n = 47$)。由上述相關分析來看，可知觀點一致組維持了對兩個議題的態度一致性，所以不論前測或後測，對兩個議題都保有正相關，也就是說支持非核家園者也傾向支持廢除死刑；觀點轉換組則並未維持對兩個議題的態度一致性，而是對於兩個議題的態度改變有一致性，也就是說經過觀點取替操弄後，支持非核家園者未必也傾向支持廢除死刑，但是對於非核家園的態度趨於緩和的參與者，也會對廢除死刑有較緩和的態度。

討論

個體在處理資訊或進行思考時，常被既有的觀點和立場主導其認知過程，因而容易產生驗證性偏誤、偏誤同化等認知偏誤。這些偏誤的結果讓個體愈發堅守自身立場，態度愈趨極端。不僅可能因此與意見不同的他人或外團體產生衝突，產生的衝突往往也不易化解。鑑於這些衝突的廣泛程度和嚴重性，有學者主張，對抗極端的驗證性偏誤是社會心理學最優先的課題之一 (Lilienfeld et al., 2009)。

回應此一呼籲，有學者表示觀點取替讓個體進行推理時對資訊作去脈絡化的處理，也就是在遠離自我觀點的狀態下進行認知性的思考。去脈絡化處理屬於類型的分析性思考，其有助於介入類型一的直覺性思考，並使個體與捷思反應脫鉤，進而減少偏誤同化的產生 (Beatty & Thompson, 2012; McCrudden et al., 2016)。若個體認知偏誤的頻率降低，態度極化的機率便也有可能下降。本研究以上述觀點取替與雙重途徑理論的想法出發，確實發現：當個體藉由觀點取替來理解並闡述對立方觀點，那麼相較於理解並闡述自身觀點，態度極化現象可以得到緩解。此緩解在操弄過程中個體不需要和觀點取替對象面對面的接觸，且一般資訊管道可見的立場理由或論點均可作為觀點取替的素材。此外，根據 LIWC 對文本的詞頻抓取以及中介分析發現，態度極化的緩解是出於去脈絡化推理的效果。此種推理是建構在自我遠離的基礎上，可由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與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使用頻率上的差異來表示其程度。然而，雖然自我遠離確實扮演中介角色，在獨立樣本檢定時卻發現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的使用頻率並無顯著組別差異，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自我遠離是一個先行抽離自我，再接著轉向他群的過程。受限於書寫時間的限制，參與者可能只有比較顯著的展現第一階段的脫離自我，而尚未深刻的將注意力的焦點轉移至他群，這或許也說明為何觀點轉換組在態度極化的指標上僅是與 0 無顯著差異，而未見反轉。自我遠離概念中隱含的兩階段過程是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態度緩解的效果會擴展到並未進行觀點取替練習的議題，產生議題的遷移效果。此效果也明確的說明了，雖然不論是第一或第二個書寫議題，觀點取替引發的態度極化均近乎於 0，但不代表觀點取替對態度沒有影響。因為對於第一個議題，觀點轉換組與觀點一致組都

是書寫自身觀點，然而其態度卻沒有像觀點一致組一樣出現極化。也就是說，在實驗設計上，因為第一階段書寫時觀點一致組和觀點轉換組採用完全相同的實驗條件，所以兩組的態度極化差異必然出於第二階段的觀點取替操作產生作用，亦即該操作對極化的延伸性緩解效果。此種透過兩階段實驗來聚焦實驗操作效果的设计，相當適用於比較態度前後測變化的研究。只要態度後測的填答環節安排在實驗的最後階段，那麼第一階段的組別差異便可明確歸因於第二階段的實驗操作。

另外，本研究認為遷移效果的成因類似群際接觸理論中所提的去偏狹化，也就是說此效果反映了個體理解既有觀點的可能不足，讓個體進行一般性地自我修正，因而對其他議題也避免抱持極端立場，重新修正評估。

（一）排除對於遷移效果的其他可能解釋

對於在第一個書寫議題上發生的遷移效果，雖然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釋，例如：該效果與認知上對既有信念的自我修正無關，而僅是某種態度類化（attitude generalization）的結果。態度類化表示：個體將對於某對象的態度類化到與該對象相關的其他事物，例如散佈態度效果（spreading attitude effect）（Walther, 2002）的發現。接觸理論的文獻便論及了態度類化。如 Tausch 等人（2010）在分析群際接觸的次級遷移效果時，便試圖釐清以下兩者孰為較顯著的中介機制：與去偏狹化相關的對內團體重新評估（ingroup reappraisal），抑或態度類化。他們對問卷調查進行中介分析發現，和初級團體有愈多接觸的個體，會對初級團體有愈溫暖的感覺，進而對次級團體也有這樣的正向感受。此中介結果即反映了態度類化的作用；相較之下，對內團體重新評估的變項並未產生穩定的中介效果。Tausch 等人因此認為，針對群際接觸的次級遷移效果，態度類化有可能是比去偏狹化更有解釋力的中介變項。

但若根據此類化的解釋，觀點取替對第一個議題態度極化的效果應該會由第二個議題的態度極化來中介，但本研究的資料中並未發現此中介效果，所以態度類化似乎並非中介機制。其次，本研究透過相關性檢定亦發現：兩議題後測態度的一致性，出現於觀點一致組，而非觀點轉換組；而態度極化的一致性則出現於觀點轉換組，而非觀點一致組。此相關性的趨勢說明，對於在態度上本來就相關聯（具有正相關的前測態度）的兩項議題，經過書寫自身觀點，參與者似乎傾向肯定自身信念，因此維持這種一致性。但是觀點取替卻讓參與者改變了這種一致性，反而是在兩項議題的極化緩解上產生相關。這反映了類似於去偏狹化的，認知性的自我修正作用。此外，研究者認為就某特定議題進行觀點取替時，引發的去脈絡化推理應在一定程度上仍具議題特殊性，並不直接預測遷移效果。去脈絡化推理的自我遠離在「針對性」的層次上不同於去偏狹化或此處所提的自我修正。研究者認為未來研究若能發展對於自我修正的測量，即可直接檢驗其作為遷移效果的中介角色。

（二）與說服理論的對話

Tuller 等人（2015）的研究同樣探討觀點取替如何影響個體對某議題的評價。但是他們的實驗需要參與者與觀點取替對象先行接觸以及課責性兩個條件。研究者因此認為，他們所發現的態度緩解途徑是較為間接的，是透過對人的好感移轉至對立場的態度去極化。相較之下，本研究發現的機制則是較直接的，觀點取替乃透過自我遠離來緩解參與者對立場的態度極化。

由於這兩種研究發現的差異，研究者認為其實觀點取替能夠透過兩個途徑改變個體的議題立場：第一途徑是較直接的、認知層次的，類似於推敲可能性模型（Petty & Cacioppo, 1996）的中央路徑，以下稱作直接途徑。此途徑可能反映了個體在認知層次上或者自覺過去判斷可能存在偏誤，或者覺察到對立觀點的價值，或認知到自己並未如自己所想的了解議題（Fernbach et al., 2013），因而改變了自己既定的立場，如本研究的發現。第二途徑則是較間接的、情感層次的，類似說服理論的周邊路徑，下稱間接途徑。此途徑可能透過改變個體對於對立方成員的態度，進而增加其對該成員立場的接受度，如 Tuller 等人（2015）的研究。也就是說，若要改變個體對「事」的態度，直接途徑為增加個體對「事」本身的認知理解，而間接途徑則是先改變個體對與事相關的「人」的看法，進而影響個體對事的觀點。

上述人與事的途徑區分，以及把 Tuller 等人（2015）的實驗效果理解為間接路徑，便可以解釋

為何實際互動與課責性在 Tuller 等人的研究中如此重要。其實不論是接觸理論或觀點取替理論，都發現不需要實際的互動便可以增加對外團體的好感（前者如 Turner et al., 2007；後者見 Todd & Galinsky, 2014），這點顯然與 Tuller 等人的結果有所不同。面對這個研究結果的差異，研究者認為，差別出於依變項的選擇。像 Turner 等人的研究是關注外團體或「人」的態度，Tuller 等人則著重於對那些團體所持議題立場或「事」的態度。而這兩種依變項對於個體來說，應該存有某種本質的差距。因此，如果研究目標是要降低對外團體的偏見，想像的觀點取替或想像的接觸都可達到效果。但目標若是緩解對議題的態度極化，而且又採取 Tuller 等人的間接途徑，實際互動便成為必要條件；而若採取本研究的直接途徑，就需要提供論點提示，讓個體對觀點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來提高認知處理傾向，此時實際互動則不再是必要的條件。

上述與說服理論兩種路徑的對照也點出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首先，根據推敲可能性理論，相較於周邊路徑，透過中央路徑和認知活動而成的態度改變應該會有更高的態度強度和持久性（Petty et al., 1995）。因此，若能比較本研究 and Tuller 等人（2015）的研究結果，應該可發現本研究的緩解效果會歷時較久。此外，亦可嘗試操弄觀點取替對象的可信度（反映周邊路徑的作用），以及論點提示的論證強度（反映中央路徑的作用）等因素，來檢視觀點取替對影響議題態度的兩種途徑（間接 vs. 直接）的效果是否確實對應 ELM 的兩種路徑（周邊 vs. 中央）。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觀點取替讓個體在書寫政策議題的論點時，注意力不致過度聚焦自身，而此種自我遠離的思考方式能進一步緩解個體對議題的態度極化。態度極化的效果還可遷移至未經觀點取替書寫的議題。此研究成果對於觀點取替引發的認知機制，乃至態度改變的相關研究均有其貢獻。以下將先討論其研究侷限，再進一步說明未來的研究方向及應用。

（一）研究侷限

雖然研究者認為本研究結果可能會比 Tuller 等人（2015）的結果有更高的態度強度，因此更具持久性，但這也反映了本研究的侷限：僅在實驗最後進行議題態度的後測，而未測量態度改變後維持的時間。缺乏了此項測量，除了難以比較不同研究方法造成的態度延續性外，也無法分析遷移效果的延續性。但一個合理的預測是：相較於實際經過觀點取替書寫的議題，僅依賴遷移效果來造成極化緩解的的議題，其緩解效果可能較不穩定，也更容易受到其他資訊刺激而消褪。

此外，本研究也未探討觀點取替對態度的緩解作用是否在特定情況下會造成反效果。像道德自我許可效果（moral self-licensing effect）（Monin & Miller, 2001）的學者主張：當個體對自己的道德形象感到滿意時，便可能容許自己產生非道德行為。基於此理論，似乎可以假設：經過觀點取替的個體在思考了對立方觀點後會自認客觀，而這種客觀的自我形象會激發正向自我感受，因而容許自己在其他（更重視或更不願退讓的）議題上表現出更極端的立場。這種反效果的可能性值得進一步探查。

再者，既然本研究關注的機制為個體對資訊的處理模式，那麼資訊本身的論證力高低便可能影響觀點取替的效果。文獻整理中提及的 McCrudden 等人（2016），在其研究中就指出觀點取替對偏誤同化的弱化效果僅出現於當資訊的論證力較低時，當資訊的論證力較高時則偏誤同化仍然存在。他們認為，當兩份資訊的論證力都不高時，人們認為無論資訊是否符合自身立場，兩份資訊的論證效力都是類似的，即便是符合立場的資訊也不足以支撐自身看法，因此留下了可以改變的空間；但是當兩份資訊的論證力都較高時，人們傾向認為符合自身既有立場的資訊有更強的論證效力。這個結論與本研究大致相符，因為本研究的資訊內容僅是論點提示，並沒有附上特別具有論證力的佐證。但若未來的研究提供觀點取替組不僅是對立方的論點提示，還包含符合自身立場的論點提示時，可能會發現當論點提示的資訊量增加、論證效力提高時，參與者便可以依賴符合自身立場的高效力論證，而不容易因為觀點取替而軟化其既有態度了。這進一步可以說明的是，當個體已經閱讀了大量符合自身立場的資訊，腦中已包含符合自身立場的高論證力資訊時，觀點取替的效果可能也會打上折扣。因此，資訊的論證力乃至個體對議題的涉入程度都可作為日後研究的調節變項來建立觀點取

替效果的邊界條件 (boundary condition)。

(二) 未來研究方向與應用

前述討論已針對後續研究方向提出幾項建議：第一，建立指標來測量類似於去偏狹化的自我修正程度，並檢測該指標在觀點取替的極化緩解上是否扮演遷移效果的中介變項。可能的指標如，個體對自己判斷正確性所具有的自信程度 (如 See et al., 2011)。當個體自認正確的自信下降時，或許代表個體意識到其既有判斷的不足，因此反映了自我修正的傾向。第二，透過態度強度指標來比較直接和間接兩種改變議題態度的途徑，亦可比較：有經過觀點取替操弄的議題以及受遷移效果影響的議題，這兩種類型議題的態度改變持久度是否有差異。

此外，本研究在觀點取替的主題選擇上，乃聚焦於政策議題。未來研究仍可探討本研究發現的態度緩解效果是否適用於其他議題，例如宗教議題、政黨偏好、國家定位等。亦可關注人際關係中涉及對立的情境，尤其當對立雙方有強烈的態度衝突時，例如親密關係的雙方對於相處方式乃至未來規劃抱有不同態度，或父母與子女對於家規的內容持有不同觀點等。

就實驗操弄效果而言，Tuller 等人 (2015) 所進行的實際互動與課責性兩因素所形成的間接途徑的效果，不但緩解了極化還產生態度的顯著改變。本研究的觀點取替操弄雖然引發直接途徑的運作，緩解了極化，但卻未強烈到足以產生態度的反轉。應該如何看待此結果的差異？首先，可以從如何操作出足以引發態度反轉的觀點取替操弄來思考，這也值得後續研究探索。再者，本研究發現觀點取替在態度極化指標上的平均值是接近於 0，意味著其作用是緩解極化，而非反向的將態度「逆轉」。這或許反映了討論環節所提及的，自我遠離包含兩個階段，不僅需要個體抽離自我，還需將注意力轉至他者，才能更強烈的消解極化。但觀照臺灣現狀，政治相關議題上不時見到民眾意見的兩極對立，若能讓民眾的態度在閱聽媒體、接收資訊後不致於更加激化，或許是促進溝通，並讓對立有可能更趨和緩的第一步。更有甚者，與 0 無顯著差異的結果，也許正凸顯了本研究類似說服理論的中央路徑的價值所在。因為透過去脈絡化的處理，個體並非出於周邊路徑所處理的資訊 (如對「人」的好感或訊息的包裝) 來改變態度，因此個體可能先以「觀望」的方式面對議題，既不極化也不反轉。此觀點與先前所提的中央路徑造成的態度改變較具持久性並不衝突，因為觀望本身代表的是等待更具說服力的資訊，其歷程確實應該比受周邊途徑影響而造成的態度改變過程要更長久。上述不同的取向，均有待未來研究的努力。

此外，在 21 世紀 20 年代的初期，各國均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的劇烈衝擊，相關議題也在臺灣成為密切關注的對象，例如普遍篩檢的必要性、隔離期的天數長短，乃至疫苗的安全性等等。這些議題既與當下社會大眾的生活緊密相關，又涉及公共衛生、生物科技、醫藥等層面的科學知識，屬於教育學者界定的社會性科學議題 (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教育學者們指出，學習理解和溝通這些社會性科學議題的相關資訊，不僅是科學教育，更是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而觀點取替的能力正是處理這類議題資訊的一項關鍵基礎 (Kahn & Zeidler, 2019; Sadler et al., 2007)。學者們表示，觀點取替的重要性在於幫助學生避免自我中心式的思考，能更開放客觀的接收和整理科學資訊，以對這些具爭議性的議題培養更深入、更符合合理性原則的觀點 (Kahn & Zeidler, 2016)。由於臺灣的教育學者們也相當重視培養學生處理社會性科學議題的能力 (可見 Chang et al., 2018; Fang et al., 2019)，研究者認為，本研究的發現或可應用於相關課程的教材編排。尤其本研究使用的觀點取替操弄方式並不複雜，唯一條件是適度的論點說明以提高學生的認知處理傾向，所以相當容易納入於課程活動的一部份，協助學生就某社會性科學議題進行觀點取替練習，藉此增進學生靈活思考、客觀分析的能力。

除了在教育領域外，本研究結果亦應於其他範疇有應用價值。如在協商和談判的過程中，當兩造抱持著對立立場時，各式論辯往往流於更極端的對峙。若在協商環節中，能夠透過制度的設計或第三方的主持，讓雙方從對方的觀點來理解對方論點，應可幫助雙方更準確的知覺他方立場的道理所在，進而緩解極化的態度，開展建設性溝通的可能。觀點取替亦適於納入審議式民主的會議流程。在審議過程中，可使參與者試著想像對立方並表達其觀點，而透過遷移效果的作用，應可使參與者

對會議中各項討論議題避免極化甚至抱持更和緩的態度，以促成更有效的溝通與交流，達致審議式民主的核心立意。

註解

- ¹ 歷年公投提案和結果可參考中選會網站的公民投票專區：<https://www.ccc.gov.tw/referendum>
- ² 推敲可能性模型多被視為雙重途徑模型的一種（如 Bodie et al., 2011; Gawronski & Bodenhausen, 2006），例如周邊路徑可對應於類型一推理，而中央路徑則對應於類型二推理。本研究與推敲可能性模型的關係在討論處有更多說明。
- ³ 在後續分析中亦嘗試控制議題書寫順序，發現各研究假設仍獲支持。
- ⁴ 本研究亦透過 ANCOVA 分析來控制參與者對第二篇書寫議題前測態度，發現觀點取替操弄的效果仍然存在（ $F(1,92) = 5.00, MSE = 1.98, p = .028, \eta_p^2 = .052$ ）。
- ⁵ 本研究亦於中介模型中，將對第二個書寫議題的前測態度納入作為控制變項，發現並不影響中介結果，仍有顯著的間接效果（ $ab = -.29, 95\% CI [-.54, -.07]$ ）及不顯著的直接效果（ $p = .191$ ）。
- ⁶ 本研究亦針對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和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分別進行中介分析，檢定其是否中介觀點取替與觀點極化的關係，但均無顯著效果。
- ⁷ 本研究亦透過 ANCOVA 分析來控制參與者對第一篇書寫議題前測態度，發現觀點取替操弄的效果仍然存在（ $F(1,92) = 5.75, MSE = 2.04, p = .019, \eta_p^2 = .059$ ）。

參考文獻

- 李錦虹、林明德（2021）：〈同理心如何發生？從應用劇場之教學切入〉。《教育心理學報》，53，127–150。[Lee, G.-H., & Lin, M.-T. (2021). How empathy develops? A theatre-based training approa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3, 127–150.] [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06](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06)
- 林瑋芳、黃金蘭、李怡青（2021）：〈婚姻平權議題之支持方與反對方的心理特性差異：以字詞分析為取向〉。《教育心理學報》，53，109–126。[Lin, W.-F., Huang, C.-L., & Lee, I.-C. (2021).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approa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3, 109–126.] [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05](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05)
- 林瑋芳、黃金蘭、林以正、李嘉玲、Pennebaker, J. W.（2020）：〈語言探索與字詞計算詞典 2015 中文版之修訂〉。《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5，73–118。[Lin, W.-F., Huang, C.-L., Lin, Y.-C., Lee, C.-L., & Pennebaker, J. W. (2020).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dictionary 2015. *Survey Research-Method and Application*, 45, 73–118.]
- 居佳勳（2018）：〈在爭議之中教學：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的同志議題教學經驗詮釋〉。《嘉大教育研究學刊》，40，99–132。[Chu, C.-H. (2018). Teaching in dispute: The experienc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aching LGBTQ issue of civics and society teachers in high school.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Journal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40, 99–132.]
- 黃金蘭、Chung, C. K.、Hui, N.、林以正、謝亦泰、Lam, B. C. P.、程威銓、Bond, M. H.、Pennebaker, J. W.（2012）：〈中文版「語言探索與字詞計算」詞典之建立〉。《中華心理學刊》，54，

- 185–201。[Huang, C.-L., Chung, C. K., Hui, N., Lin, Y.-C., Seih, Y.-T., Lam, B. C. P., Cheng, W.-C., Bond, M. H., & Pennebaker, J. W. (201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dictionary.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4*, 185–201.] <https://doi.org/10.6129/CJP.2012.5402.04>
- 劉政宏、張文哲、陳學志、黃博聖（2008）：〈你贊成或反對立場對立者的論點？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CSAAM）〉。《中華心理學刊》，50，327–346。[Liu, C.-H., Chang, W.-J., Chen, H.-C., & Huang, P.-S. (2008). Do you agree with the arguments of counterpositional communicators? An arguments agreement/disagreement model of a counterpositional situation (CSAAM).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 327–346.] <https://doi.org/10.6129/CJP.2008.5003.07>
- 劉政宏、陳學志、張文哲、張仁和（2011）：〈論點立場與品質對高中生論點贊否反應影響的意識處理機制〉。《教育心理學報》，42，491–516。[Liu, C.-H., Chen, H.-C., Chang, W.-J., & Chang, J.-H. (2011). The conscious mechanisms of the influences of argument position and argument qualit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gument agreement/disagreement respons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2*, 491–516.] <https://doi.org/10.6251/BEP.20100818>
- 蕭怡靖（2014）：〈從政黨情感溫度計解析台灣民眾的政治極化〉。《選舉研究》，21（2），1–42。[Hsiao, Y.-C. (2014).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aiwan: An analysis on mass feeling thermometer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2), 1–42.] <https://doi.org/10.6612/tjes.2014.21.02.01-42>
- Batson, C. D., Early, S., & Salvarani, G. (1997). Perspective taking: Imagining how another feels versus imagining how you would fe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7), 751–75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7237008>
- Beatty, E. L., & Thompson, V. A. (2012). Effects of perspective and belief on analytic reasoning in a scientific reasoning task. *Thinking & Reasoning, 18*(4), 441–460. <https://doi.org/10.1080/13546783.2012.687892>
- Bodie, G. D., Burlison, B. R., Holmstrom, A. J., McCullough, J. D., Rack, J. J., Hanasono, L. K., & Rosier, J. G. (2011). Effects of 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emotional upset on processing supportive messages: Two tests of a dual-process theory of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outcom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3), 350–376. <https://doi.org/10.1111/j.1468-2958.2011.01405.x>
- Chang, H.-Y., Hsu, Y.-S., Wu, H.-K., & Tsai, C.-C. (2018).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socio-scientific reasoning in a mobile augmented real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40*(12), 1410–1431. <https://doi.org/10.1080/09500693.2018.1480075>
- Dishon, G., & Kafai, Y. B. (2020). Making more of games: Cultivating perspective-taking through game design. *Computers & Education, 148*(4), 103810. <https://doi.org/10.1016/j.compedu.2020.103810>
- Dugan, J. P., Bohle, C. W., Woelker, L. R., & Cooney, M. A. (2014). The role of social perspective-taking in developing students' leadership capacities. *Journal of Student Affairs Research and Practice, 51*(1), 1–15. <https://doi.org/10.1515/jsarp-2014-0001>
- Edwards, K., & Smith, E. E. (1996). A disconfirmation bias in the evaluation of argu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1), 5–2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1.5>

- Evans, J. S. B. T. (2007). On 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 in dual process theories of reasoning. *Thinking & Reasoning, 13*(4), 321–339. <https://doi.org/10.1080/13546780601008825>
- Evans, J. S. B. T. (2011). Dual-process theories of reason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developmental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al Review, 31*(2), 86–102. <https://doi.org/10.1016/j.dr.2011.07.007>
- Evans, J. S. B. T. (2012). Spot the differenc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wo kinds of processing. *Mind & Society, 11*(1), 121–131. <https://doi.org/10.1007/s11299-012-0104-2>
- Evans, J. S. B. T., Handley, S. J., & Harper, C. N. J. (2001). Necessity, possibility and belief: A study of syllogistic reason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ection A, 54*(3), 935–958. <https://doi.org/10.1080/02724980042000417>
- Evans, J. S. B. T., Newstead, S. E., Allen, J. L., & Pollard, P. (1994). Debiasing by instruction: The case of belief bias.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6*(3), 263–285. <https://doi.org/10.1080/09541449408520148>
- Evans, J. S. B. T., & Stanovich, K. E. (2013). Dual-process theories of higher cognition: advancing the debat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3), 223–241.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2460685>
- Fang, S.-C., Hsu, Y.-S., & Lin, S.-S. (2019). Conceptualizing socio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 from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17*(9), 427–448. <https://doi.org/10.1007/s10763-018-9890-2>
- Fernbach, P. M., Rogers, T., Fox, C. R., & Sloman, S. A. (2013). Political extremism is supported by an illusion of understand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6), 939–946.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2464058>
- Fineberg, S. K., Deutsch-Link, S., Ichinose, M., McGuinness, T., Bessette, A. J., Chung, C. K., & Corlett, P. R. (2015). Word use in first-person accounts of schizophreni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6*(1), 32–38. <https://doi.org/10.1192/bjp.bp.113.140046>
- Galinsky, A. D., & Moskowitz, G. B. (2000). Perspective-taking: Decreasing stereotype expression, stereotype accessibility, and in-group favorit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4), 708–72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8.4.708>
- Gawronski, B., & Bodenhausen, G. V. (2006). Associative and propositional processes in evalu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 chang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2), 692–73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2.5.692>
-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Guilford Publications.
- Hergovich, A., Schott, R., & Burger, C. (2010). Biased evaluation of abstracts depending on topic and conclusion: Further evidence of a confirmation bias within scientific psychology. *Current Psychology, 29*(3), 188–20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0-9087-5>
- Kahn, S., & Zeidler, D. L. (2016). Using our heads and HARTSS*: Developing perspective-taking skills for socioscientific reasoning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27*(3), 261–281. <https://doi.org/10.1007/s10972-016-9458-3>
- Kahn, S., & Zeidler, D. L. (2019).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perspective taking in support of socioscientific

- reasoning. *Science & Education*, 28(3), 605–638. <https://doi.org/10.1007/s11191-019-00044-2>
- Knapp, M. L., Hart, R. P., & Dennis, H. S. (1974). An exploration of deception as a communication construc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15–29. <https://doi.org/10.1111/j.1468-2958.1974.tb00250.x>
- Lilienfeld, S. O., Ammirati, R., & Landfield, K. (2009). Giving debiasing away: Ca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rrecting cognitive errors promote human welfar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4), 390–398. <https://doi.org/10.1111/j.1745-6924.2009.01144.x>
- Lord, C. G., Ross, L., & Lepper, M. R. (1979).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11), 2098–210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7.11.2098>
- Lord, C. G., & Taylor, C. A. (2009). Biased assimilation: Effects of assum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ew eviden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3(5), 827–841. <https://doi.org/10.1111/j.1751-9004.2009.00203.x>
- McCrudden, M. T., Barnes, A., McTigue, E. M., Welch, C., & MacDonald, E. (2016). The effect of perspective-taking on reasoning about strong and weak belief-relevant arguments. *Thinking & Reasoning*, 23(2), 115–133. <https://doi.org/10.1080/13546783.2016.1234411>
- Monin, B., & Miller, D. T. (2001). *Moral credentia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33–4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1.1.33>
- Newman, M. L., Pennebaker, J. W., Berry, D. S., & Richards, J. M. (2003). Lying words: Predicting deception from linguistic styl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5), 665–67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3029005010>
- Nickerson, R. S. (1998).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2), 175–220. <https://doi.org/10.1037/1089-2680.2.2.175>
- Pennebaker, J. W., Boyd, R. L., Jordan, K., & Blackburn, K. (2015). *Th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LIWC2015*. <https://doi.org/10.15781/T29G6Z>
- Pennebaker, J. W., Mehl, M. R., & Niederhoffer, K. G. (2003).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natural language use: Our words, our sel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1), 547–57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4.101601.145041>
- Perkins, D. (1985). Postprimary education has little impact on informal reaso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7(5), 562–571. <https://doi.org/10.1037/0022-0663.77.5.562>
- Pettigrew, T. F. (1997). Generalized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on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173–18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7232006>
- Pettigrew, T. F. (2009). 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 of contact: Do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spread to noncontacted outgroups? *Social Psychology*, 40(2), 55–65. <https://doi.org/10.1027/1864-9335.40.2.55>
-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2006).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5), 751–78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0.5.751>
- Petty, R. E., & Cacioppo, J. T. (1996). *Attitudes and persuasion: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 Westview Press. <https://doi.org/10.4324/9780429502156>
- Petty, R. E., Haugtvedt, C. P., & Smith, S. M. (1995). Elaboration as a determinant of attitude strength: Creating attitudes that are persistent, resistant, and predictive of behavior. In R. E. Petty & J. A. Krosnick (Eds.), *Attitude strength: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pp. 93–130).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Quercia, D., Ellis, J., Capra, L., & Crowcroft, J. (2011, October 9–11). In the mood for being influential on twitter. 3rd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MIT, Boston, MA. <https://doi.org/10.1109/PASSAT/SocialCom.2011.27>
- Rude, S., Gortner, E.-M., & Pennebaker, J. (2004). Language use of depressed and depression-vulnerable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8*(8), 1121–1133.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441000030>
- Sadler, T. D., Barab, S. A., & Scott, B. (2007). What do students gain by engaging in socioscientific inquiry?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37*(4), 371–391. <https://doi.org/10.1007/s11165-006-9030-9>
- See, K. E., Morrison, E. W., Rothman, N. B., & Soll, J. B. (2011).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power on confidence, advice taking, and accurac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6*(2), 272–285.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11.07.006>
- Spengler, P. M., Strohmer, D. C., Dixon, D. N., & Shivy, V. A. (1995). A 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for trai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3*(3), 506–534.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95233009>
- Stanovich, K. E., & West, R. F. (2000).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son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rationality debat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3*(5), 645–665.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0003435>
- Stirman, S. W., & Pennebaker, J. W. (2001). Word use in the poetry of suicidal and nonsuicidal poet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3*(4), 517–522. <https://doi.org/10.1097/00006842-200107000-00001>
- Taber, C. S., & Lodge, M. (2006). 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3), 755–769.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07.2006.00214.x>
- Tausch, N., Hewstone, M., Kenworthy, J. B., Psaltis, C., Schmid, K., Popan, J. R., Cairns, E., & Hughes, J. (2010). 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Alternative accounts and underlying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2), 282–302. <https://doi.org/10.1037/a0018553>
- Thompson, V. A., Evans, J. S. B. T., & Handley, S. J. (2005). Persuading and dissuading by conditional argument.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3*(2), 238–257. <https://doi.org/10.1016/j.jml.2005.03.001>
- Todd, A. R., Bodenhausen, G. V., Richeson, J. A., & Galinsky, A. D. (2011). Perspective taking combats automatic expressions of racial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6), 1027–1042. <https://doi.org/10.1037/a0022308>
- Todd, A. R., & Galinsky, A. D. (2014). Perspective-taking as a strategy for improving intergroup relations: Evidence, mechanisms, and qualification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8*(7),

- 374–387. <https://doi.org/10.1111/spc3.12116>
- Tuller, H. M., Bryan, C. J., Heyman, G. D., & Christenfeld, N. J. S. (2015). Seeing the other side: Perspective taking and the moderation of extrem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9*, 18–23. <http://dx.doi.org/10.1016/j.jesp.2015.02.003>
- Turner, R. N., Crisp, R. J., & Lambert, E. (2007). Imagining intergroup contact can improve intergroup attitude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0*(4), 427–441.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07081533>
- Vescio, T. K., Sechrist, G. B., & Paolucci, M. P. (2003). Perspective taking and prejudice reduction: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empathy arousal and situational attribu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4), 455–472. <https://doi.org/10.1002/ejsp.163>
- Walther, E. (2002). Guilty by mere association: Evaluative conditioning and the spreading attitude e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6), 919–93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2.6.919>
- Wason, P. C. (1960). On the failure to eliminate hypotheses in a conceptual task.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3), 129–140. <https://doi.org/10.1080/17470216008416717>
- Wojcieszak, M. (2011). Deliber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4), 596–617.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2011.01568.x>
- Wojcieszak, M., & Price, V. (2010). Bridging the divide or intensifying the conflict? How disagreement affects strong predilections about sexual minorit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1*(3), 315–339.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21.2009.00753.x>
- Wolfe, C. R., & Britt, M. A. (2008). The locus of the myside bias in written argumentation. *Thinking & Reasoning, 14*(1), 1–27. <https://doi.org/10.1080/13546780701527674>

收稿日期：2021年07月07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1年11月26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2年01月07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01月10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2, 54(2), 283–306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The Mitigating Influence of Perspective Taking on Attitude Polarization: An Analysis of Mediation and Transfer Effect

Chuan-Ren Isaac
Chu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Surrey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i-Cheng L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n-Lan Huang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izens in modern society are faced with complex and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For example, Taiwanese referenda in 2018 and 2021 involved 10 and 4 proposals, respectively. These proposals covered a range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such as whether to resum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whether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Discussions of these multifaceted topics often caused heated debates and resulted in attitude polarization. People often became more opinionated and believed more firmly in their initial stances on the issues. As attitude polarization is a major cause of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conflicts and even social unres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how to mitigate the 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issues.

This study drew upon the theory of perspective taking for insights into the mitigation of attitude polarization. Perspective taking refers to one's attempt or ability to consider something from someone else's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taking has been studied by psychologists as a means of reducing prejudice, fostering cooperation, and lowering reasoning biases that were found to be responsible for attitude polarization.

Attitude polarization is, at least partially, a result of bi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For example, people may become more entrenched in their opinions after engaging in biased assimilation, which entails, for instance, evaluating information supporting their opinions as more convincing than that opposing their opinions. Per the dual process theory, the reasoning biases that cause attitude polarization often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Type 1 processing, which usually involves responding to information intuitively and generating outcomes consistent with existing beliefs. Such outcomes can be either reinforced or overridden by Type 2 processing, which involves deliberation and evidence-based consideration. If an intuitive response is reinforced, an individual's attitude is likely to become entrenched, leading to polarization; if overridden, attitude polarization may be inhibited or attenuated. We proposed that perspective taking may serve as an overriding mechanism to mitigate attitude polarization.

Perspective taking enables individuals to undertake a form of Type 2 processing called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which features a type of self-distancing that allows individuals to decouple existing beliefs from reasoning processes. Such a reasoning

style can arguably be triggered by perspective taking because this requires individuals to examine information by considering their own thinking with increase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adopting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Although research has suggested a link between perspective taking and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how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can be measured and whether it indeed serves as a mediator between perspective taking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have yet to be deeply investigated.

Integrating studies on perspective tak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ttitude change, this study proposed three hypotheses and tested them by conducting an experiment involving a writing task focused on social issues. First, we hypothesized that perspective taking would mitigate attitude polarization. We measured attitude polarization by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 in attitude toward an issue before and after the writing task. Second, we proposed that the mitigation of attitude polarization would be mediated by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induced by perspective taking. To investigate this hypothesis, we used a text analysis tool, namely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 Research on LIWC has shown that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people use words in their writing reflects psychological features and cognitive styles. Because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features a shift of attention from the self to others, we argued that it can be detected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using third-person plural and first-person singular pronouns. The greater this difference is, the greater the extent to which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is likely to have been adopted by a writer. Finally, we drew upon the 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d proposed that the mitigating effect outlined in the first hypothesis would influence people's attitudes even when not directly instructed to engage in perspective taking. To test this transfer effect, the writing task included two sessions, and perspective taking instructions were only given in one of the sessions.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was as follows. We recruited 95 participants (50 female; mean age = 23.7 years, $SD = 3.4$) for the writing task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first indicated their attitude toward two issues that are controversial in Taiwan (making Taiwan nuclear-free and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 on a 7-point Likert scale with responses ranging from *absolutely disagree* to *absolutely agree* and then wrote arguments supporting or opposing the issues in two writing sessions. When writing about one of the issues in the first session, all participants wrote arguments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 when writing about the other issue in the second session,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continued to write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 (control condition) while the other half wro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meone holding the view opposite of their own (perspective-taking condition). Participants then again indicated their attitude toward both issues using the same 7-point scale. The whole experiment took approximately 30 minutes to complete.

Analysis of attitud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two condition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M = 0.77$, $SD = 1.09$), for the essays written in the second session, participants in the perspective-taking group ($M = -0.02$, $SD = 1.74$) displayed weaker attitude polarization, $t(93) = 2.63$, $p = .010$, $d = 0.540$.

Based on LIWC output for the second essay for the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indicator (frequency of use of third-person plural pronouns minus that of first-person singular pronoun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M = -1.04$, $SD = 1.20$), the perspective-taking group ($M = -0.08$, $SD = 0.95$) engaged in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to a greater extent, $t(93) = 4.34$, $p < .001$, $d = 0.890$. Mediation analysis using the SPSS Process Macro further revealed that this difference mediated the mitigating effect found during analysis, and thus, participants in the perspective-taking group engaged in more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and exhibited weaker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direct effect = -0.28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54, -0.07]$; direct effect = -0.50 , $p = .122$.

Because all participants wrote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 in the first session, the difference in attitude polariz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first essay allowed us to examine the transfer effect. Compared with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M = 0.79$, $SD = 1.56$), those in the perspective-taking group ($M = 0.10$, $SD = 1.37$) again displayed weaker attitude polarization, $t(93) = 2.27$, $p = .026$, $d = 0.465$.

Taken together,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perspective taking mitigated 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issues due to greater engagement in decontextualized reasoning, a form of Type 2 processing that involves self-distancing. This mitigating effect was evident for issues where the perspective-taking manipulation was not applied, thus indicating a transfer effect. These findings can have valuable implications for areas where controversies and conflicts abound. For exampl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disputes occurred over issues such as the necessity of vaccines, legitimacy of lockdown measur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pplies. These issues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s), which have been defined as crucial real-world scientific issues with social significance. Other examples of SSIs include issues pertaining to climate change,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ducts, and genetic testing. As were the issues used in our writing tasks, SSIs are often controversial in nature, an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m is often processed through an ideological lens, which can lead to attitude polarization and conflict. Helping students develop the ability to approach SSIs with scientific and fact-based reasoning has become a key objective of science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manipulation used in our stud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course materials to help students analyze SSI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avoid becoming entrenched in their opinions. Furthermore, such a practice may even affect perspectives on issues not discussed in class due to the transfer effect of perspective taking. Whether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perspective taking on attitude polarization can be replicated in the classroom or other real-world settings warrants further exploration.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other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attitude polarization, perspective taking, transfer effect, text analysis